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心理溯源与构成机制

时潇含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促进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情感与文化动机的共同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从理论内涵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自信不仅是新时代精神气质的凝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由之路的文化引领，最终目标是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5）02-0101-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使命，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1]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以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开放包容为途径，构建既有历史传承又富时代活力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方向性指引下，文化自信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更成为推动文化创新、塑造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在力量。本文将从心理

溯源和构成机制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层次理论基础及其在当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意义。

一、文化自信的心理溯源机制：认知、认同、情感与动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其提升至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理论命题^[2]，习近平文化思想纲要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课题“全球竞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与路径”。

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5]。文化自信自强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系统的重要构成,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新时代反映历史主题、回答时代课题、代表文明方向,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产物。

文化自信,既体现在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积极心理体验和正面评价,也源于这一体验在深层次心理结构中的溯源过程与内在构成机制。首先,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文化自信根植于民族集体记忆、历史传承和内在的价值认同,这一过程表现为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情结和心理安全感,其内化结果构成了稳定的心理“资本”。其次,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指出,个体通过对所属民族和文化群体的认同,获得自尊和安全感,这为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6]。进一步看,文化自信的构成机制展示了个体情感、认知和价值观在持续的群体互动中所形成的动态平衡,这种机制正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强调的那样,不仅巩固了内群体的正面评价,也激发了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因此,文化自信不仅成为推动文化创新与传承的重要内在动力,更为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凝聚精神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文将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1997)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出发^[7],分析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通过不断验证自我能力,而在群体层面上扩展为集体效能,最终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心理支撑。按照班杜拉的理论,集体效能主要通过认知、认同、情感、动机等机制的运作发挥作用^[8]。

(一) 文化认知构建心理根基

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应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认知之上。首先,这意味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文

化传承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深层心理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9]。莫里斯在《集体记忆》(Halbwachs Maurice, 1925)中强调,这种集体记忆使得历史传承成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10]。同时,文化背景对个体自我构念具有深远影响。赫泽尔·马库斯与北山忍(Markus & Kitayama, 1991)在对文化认知的研究中表明,亚洲文化对个性有着独特的概念,这些概念强调个体之间的基本关联性^[11]。西方文化既不假设也不重视个人之间的明显联系,相反,个人通过关注自我以及发现和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在属性来寻求保持独立于他人。不同文化背景对于这些理解的认知、情感和动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机制和行为方式。文化背景对人的影响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其次,真正的文化自信并非源自盲目的自大或对他者的无知,而是基于对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2]。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至今的文明体,凭借其独特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历经数千年仍然延续至今,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影响力。文化认知有助于文化主体建立自我价值观念,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积极拓宽文化视野,减少偏见,增强文化敏感性,建立正确的文化和自我关系。这种基于深刻文化认知的自信,源自于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认可,以及在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中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使得中华文化在历经坎坷后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二) 文化认同加强群体归属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特定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涉及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的形成。文化认同感源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文化认同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首先来自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文化信念的认同。价值观涵盖了一个民族

对真、善、美的理解，对珍视事物的偏好以及其观察世界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些价值观决定了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特征和深层意义。一旦形成，价值观便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混无定所、行无依归。”^[13]其次，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而塑造特定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以“和”为例，这一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体现了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种文化观念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黄土高原与黄淮平原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活动区域，与尼罗河、恒河及幼发拉底河等大河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以小河流域的旱地农业为特征。为了避开水灾，丘陵地带成为农业聚集地，古代村落因此形成。人们聚居而居，逐渐形成了重视人际关系、注重“和”的理念^[14]。文化认同通过社会认同机制塑造个体的归属感，来源于此的文化自信进一步影响了文化特征的形成与传承。

（三）文化情感塑造共同意识

就文化情感而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深植于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成就。文化情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其核心在于集体记忆的传承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5]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植根于群体心理及其复杂交互机制的深层心理状态。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强调，民族不仅仅是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群体，而是一个共享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象征符号的共同体^[16]。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不仅超越了地域界限，也在王朝更替与社会变迁中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心理基础。古人对“何谓中国”的理解，正是文化情感如何形塑民族认同的典型体现。《史记·秦本纪》云：“中国者，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这一定义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以制度、

文化和价值观为支撑的文明共同体。

在历史的动荡中，这种文化情感更是促成了文化自信的延续。民族危机往往伴随着文化复兴的浪潮，中华民族在历次社会动荡与外来冲击中均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钱穆曾细数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危机：“经过魏晋南北朝，而有唐，是为新生；又经过五代十国而有宋，又是新生；再经元朝到明，又是新生；更经满清二百余年，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至于民国，又是新生。”^[17]这种“新生”不仅是政治秩序的重建，更是文化认同的再塑与强化。即使在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的时刻，中国人依然坚信自身文化的连续性，正是这一信念，使得文化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最终转化为深厚的文化自信。文化情感通过集体记忆、民族认同和文化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历史风雨时始终能够凝聚共识，焕发新的生命力，使得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传承，并最终形成今日坚实的文化自信。

（四）文化动机承载现实意义

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历史积淀和文化成就，更关乎文化在当代全球格局中的现实意义。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纷争、气候危机、资源短缺、科技伦理困境，人类社会正站在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更具可持续性的文明模式，成为全球思考的重要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五个世纪，西方文明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对自然、宇宙、物质世界及自身社会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ax Weber, 1930）中指出，西方经济模式基于功利理性与个人主义，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跃迁^[18]。然而，资本的无序扩张、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1986）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分析，现代化本身正在制造系统性风险，全球变暖、生态破坏、能

源危机正是这种风险的典型表现^[19]。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生态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意义。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思维与长期主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线性发展观，更关注循环与均衡。

不仅如此，中国在科技伦理、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也显示出其文化智慧的现实价值。以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为例，它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路径。在科技伦理方面，儒家强调“仁义”原则，可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提供伦理指南，避免单纯的技术至上主义带来的道德危机。面对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困境，中国文化所承载的生态伦理、社会责任和整体性思维，或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不仅关乎自身的复兴，更承载着对人类未来的责任。

二、文化自信的构成机制：文化精神和文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这一论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文化主体性的强调，也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竞争的现实挑战。文化精神的自信关乎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与价值体系，文化道路的自信则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一）文化精神的自信

历史积淀孕育了文化精神的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是植根于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传承之中。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观，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的。从上古神话到儒释道思想，中国文化精神展现出强大的连续性与包容性。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创世神话蕴含着对秩序与创造的崇尚，《山海经》

《淮南子》等典籍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天人合一，佛教在本土化进程中发展出大乘精神，这些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框架，使中华文明在历经王朝更迭、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度的延续性和凝聚力。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前行，秉持“两个结合”为基本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积淀所赋予的文化自信不断夯实，其深厚性、稳定性与持续性日益凸显。

第二，思想体系构建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精神进一步发展为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不仅塑造了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在近现代革命岁月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展现出新的精神气质。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民本思想”在现代语境下转化为家国情怀与民族复兴意识。革命时期，“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集体主义”“人民至上”原则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能力的适应性，使文化能够有效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特别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党的二十大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七个着力”的思想指导，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道路上的行动指南。

第三，传播载体拓展文化精神的存续空间。从传播学角度来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64）提出“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观点，强调媒介形态的演变会深刻影响文化的内容与社会结构。中华文化精神的延续，正是通过媒介的不断革新得以代际相传，并在不同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文字不仅记录历史、规范社会秩序，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书写与典籍编纂的发展，使儒释道思想得以系统化，并在经典化的过

程中确立了文化精神的核心框架。自“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到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中国文化精神在媒介的更迭中不断适应时代需求,并扩大其影响力。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重塑了社会结构,使文化传播突破时空限制,形成更加动态的互动模式。影视、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新媒介正在成为文化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精神在新媒介的助力下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创新力。《黑神话:悟空》等数字艺术作品,以技术创新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使中华文化符号以全新的视觉语言进入全球文化市场。这些现象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不仅能够能够在媒介变革中保持延续性,还能够借助现代科技拓展其全球影响力,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话语阐释和叙事传播,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形象。

(二) 文化道路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核心在于对文化道路的坚定认同。中国的文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契合国家发展实际,秉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道路,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智慧与力量,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择流汇聚,最终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塑造出富有生机与时代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纵观历史,中华文化在不断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个人修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与自我更新能力。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宋元明清的学术创新与社会变迁,使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特别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在长期互动中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架构,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也对东亚

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经历了深刻的反思与重塑,在自我革新中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不仅没有被历史湮没,反而在国家治理、文化自信、社会价值观塑造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文化道路的自信,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积淀之上。中华文化并非静态不变,而是不断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生。从古代王朝的制度礼乐,到近代文化的自省革新,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道路始终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在守正创新中开辟未来。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产物,也是凝聚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与价值追求的重要力量。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充满了战争、革命和变革的鲜血与牺牲。美国历史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 2005)曾将“战争”与“革命”作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21]。这一时期,革命文化的形成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数先烈和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与行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北坡精神等革命精神,都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锤炼出来的。它们代表着一种深沉的民族觉醒,表现为不畏强敌、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贯穿于中国革命历程的每个重要节点。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具象体现。它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全社会树立了价值标杆。无论在抗击外来侵略的岁月,还是在今日的改革创新潮流中,革命文化的精神力量依然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深

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理念、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需求，将中国的历史经验、社会实践与时代需求融合，形成了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紧密契合的独特文化形态。中国的文化道路自信，正是在这一深刻理论上不断发展壮大的，既来源于对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也源自对未来方向的坚定把握，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动创新、开辟未来的精神力量。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文化道路的自信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展现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动性。

三、文化自信的挑战与机遇：全球化与技术变革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浪潮中，各国文化在交融互鉴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文化自信不仅关乎民族认同，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22]。然而，面对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技术革命和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兴起，正在重塑文化传播方式与认知体系，如何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保持主体性，在技术赋能的时代维护文化的独特性、创新性与包容性，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下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格局，都是当前文化发展战略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文化生产的创新力

全球化时代具有传播优势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认同产生冲击。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依托其科技优势和资本支持，占据了全球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好莱坞电影、欧美流行音乐、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电子游戏等，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市场化运作，构建了全球性文化话语体系，

形成强势的文化渗透力，使受众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

这要求中华文化以文化自信提高文化生产的创新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辩证把握时代精神风貌和民族价值追求，推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对接。适应信息技术变革趋势，构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强化文化人才培养，激发社会整体文化创新活力，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文化生产的创新力既有内容创新，即文化产品在思想观念、叙事方式、价值表达等方面的突破，如《三体》《流浪地球》等作品不仅创新性地融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科技想象，也拓展了全球科幻叙事的边界；又有形式创新，包括艺术表现形式、媒介形态和叙事结构的创新，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美术风格上融合了国风元素，并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等方面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使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更符合时代精神；还有产业模式创新，通过IP开发、多平台分发、跨界融合等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文化产业链的重构，最为突出的实践是中国网络文学IP孵化体系，通过“网文—漫画—影视—游戏”多链路开发，以创新实现文化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二）文化传播的主导力

在信息时代，文化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空间的文化霸权风险加剧，部分强势文化借助技术优势扩大影响力，使本土文化在全球传播中处于弱势。与此同时，信息真实性与文化表达权威性受到冲击，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掺杂虚假信息，虚拟现实技术的高度沉浸式体验也可能造成叙述的片面化甚至扭曲化。在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格局中，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文化价值的坚守，如何在海量信息流中保障文化多样性与真实

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这要求中华文化以文化自信提高文化传播的主导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传播不仅仅是文化内容的传播，更是文化价值、文化理念与文化认同的输出。中国文化的传播主导力不仅表现在中华文化的全球扩展上，还体现在全球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建构以及价值观引导中的作用。国家应积极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塑，优化全球传播网络布局，提升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与协同效应。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新兴数字技术的优势，提升信息传播的智能化水平

近年来，中国通过建设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网络，不断增强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令中国文化能够快速跨越国界，直达全球受众，增强了文化传播的即时性与互动性。此外，文化传播的主导力还表现在文化产品和内容的全球化适应上。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不断吸纳国际市场的需求与口味。技术革新、载体更新、话题创新，文化出海涌现出多种新载体，网文网剧网游，正成为文化出海“新三样”。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达到 43.5 亿元，同比增长 7.06%^[23]。

（三）话语体系的影响力

当前国际媒体话语体系依然由西方主导，全球信息传播的议程设置、价值观表达和叙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全球话语权不均衡。西方视角、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且信息框架单向塑造。西方叙事方式往往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塑造全球事件的解释框架，使用特定话语结构，使其符合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非客观呈现全球多元视角。

这要求中华文化以文化自信提高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构建高效能国际传播体系，重塑全球传播格局，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推动跨媒介、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传播体系建设。

完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范式，提升国家叙事的国际识别度与话语影响力。建立全球文明倡议的制度化实践机制，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增强文明对话的广度与深度。优化国际传播治理模式，增强信息生产的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精准性与适应性，并推动全球文化传播格局向多元化发展，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制度创新与合作深化，以实现更公平的话语权分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传播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24]意在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持续发展过程中，构建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进一步拓展对外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话语体系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承载着文化的核心价值、历史经验和制度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设置议题和议程，突出特色，塑造传播亮点，增强国际舆论场上的影响力^[25]。2023 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并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同构成“三大全球倡议”。这一系列倡议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以文化自信促进全球合作的积极姿态，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2024 年，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推动跨文化交流在增进理解、消除偏见、凝聚共识和深化国际协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6]。中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通过自主构建和传播符合本国价值观的语言、话语体系，深刻影响国际舆论，广泛凝聚全球认知。

参考文献：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2-43，42.
- [3][12][22]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43，105，95.

[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2.

[5] 习近平.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 求是, 2025, (8).

[6] Tajfel H, Turner J 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C]// Austin W G, Worchel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1979: 33-37.

[7]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W. H. Freeman, 1997: 477.

[8] 姜东月, 郭本禹. 从个体效能到集体效能: 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的新发展[J]. 心理科学, 2002, (1).

[9]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76.

[10] Halbwachs M. The Collective Memor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40.

[11]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2): 224-253.

[1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11.

[14] 刘超骅. 山河岁月: 疆域开拓与文化的地理环境[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83-85.

[15]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新华月报, 2019, (15).

[16] Smith A D.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3.

[17] 钱穆. 历史与文化论丛[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224.

[18]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简惠美,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8-30.

[19]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20.

[2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3.

[21] [美] 沙培德.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M]. 高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1-52.

[23] 卢泽华. 看! 中国网文“一键”出海[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10.

[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40.

[25]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02.

[26] 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N]. 人民日报, 2024-06-08.

作者: 时潇含,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钟晓媚